

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Universities East and West

东西方大学
与文化

露丝·海荷 主编 赵曙明 主译



湖北教育出版社
OISE 出版社

**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Universities East and West

**东西方大学
与文化**

露丝·海荷 主编 赵曙明 主译

湖北教育出版社
OISE 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东西方大学与文化		©露丝·海荷 主编 赵曜明 主译
出版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电话:583043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通山县印刷厂	(437600·通羊镇南市路 165 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11.75 印张
版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0 千字	印数:1 1 000 册
ISBN 7-5351-1348-6/G·1086		定价:17.6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译者说明

受湖北教育出版社胡伟编辑之托，我组织了本书的编译工作。本书主要论述了跨文化知识的教育问题，该问题与我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1990—1991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担任工商管理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时，就对“国际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国际人力资源管理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如何培养人才，而在跨文化培训中，跨文化知识的教育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深入研究跨文化知识的教育问题，对于发展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愿意承担本书编译工作的原因之一。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译文中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们批评指正。

赵曙明

1993年于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

作者简介

约瑟夫·艾加斯 (Joseph Agassi) 约瑟夫·艾加斯 (Joseph Agassi) 是加拿大约克大学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兼职哲学教授。著作丰富, 涉及哲学、科学史、经济、社会、政治、教育、精神病学等诸多领域。

蔡拉·爱尔·兹拉 (Zahra Al Zeera) 在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取得博士学位, 她以伊斯兰教育为研究重点, 现任巴林大学教育系教授。

菲利普·阿特巴赫 (Philip Altbach) 纽约州立大学比较教育中心主任, 教育组织、管理和政策系教授。阿特巴赫 (Altbach) 教授是《高等教育》、《教育政策》、《教育发展国际》等杂志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系列丛书《教育新时代》的主编。

法特米·巴盖里恩 (Fatemeh Bagherian) 是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社会心理学系的博士研究生, 她 1979 年在德黑兰爱尔扎拉大学取得心理学硕士学位。

雷·布哈特 (Ray Barnhardt) 阿拉斯加大学跨文化和农村发展学院的教授。从 1970 年起他就开始从事民族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让·伯格伦 (Len Berggren) 加拿大塞蒙·弗雷泽大学

的数学教授。他的著作有《中世纪伊斯兰的数学》(1986)、《从古代预兆到统计结构》(1987)和《古希腊球面天文学的演释》(1992)等。多年来他一直任《历史数学》杂志的副主编。

格利高利·布鲁(Gregory Blue) 于198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教授。布鲁(Blue)博士专长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传统中国对西方社会学的影响。他的近作有1991年出版的《传统中国在西方社会观中的地位》以及1992年由李约瑟编辑出版的《中国的科学和文明》中的一章“西方所认识的中国”。

拉尔夫·克罗齐(Ralph Croizier) 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该校太平洋和东方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目前的研究课题有“20世纪中国艺术的社会和学术史”、“比较政治艺术”、“18世纪末中国、日本和西方的艺术交流”和“世界历史史料编纂”等。他的近期著作有《现代中国的艺术和革命:岭南派绘画1906—1951》该书出版于1988年。

埃尔·德拉克(Earl Drake) 现任加拿大赛蒙·弗雷泽大学兰戴维国际文化通讯中心教授。他多年从事外交事业,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之后又任加拿大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此外他还在世界银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任过职。

乌苏拉·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 在柏林科技大学取得实验物理学博士学位。从1967年到1989年退休,一直任多伦多大学工学院冶金和材料科学系教授。除了她对材料结构和性质的研究外,她还教授、研究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妇女问题、和平和人权等多方面的学问。

纪树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哲学研究所教授。他的研究重点为科学哲学和中西文化比较。1987年他编著了《科学知识的进化：鲍勃科学哲学选集》，1990年他出版了《跨越科学界标：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他的事业还包括主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出版物《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

弗纳·柯可那斯 (Verna Kirkness) 系加拿大卑斯省省立大学教育管理、成人和高等教育系教授。她还兼任加拿大印第安部族学习中心主任。该中心已有30多年历史，从事各种类别的印第安教育，包括政策制定和教学。除了她自己丰富的出版物外，她还任《加拿大民族教育杂志》的主编。

李秉德 前西北师范大学校长。早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赴瑞士洛桑和日内瓦大学以及法国巴黎大学当访问学者。李教授的近作《教学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论》为全国教育院校广泛使用。

鲁洁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哲学和社会学教授，中国第一位女性教育博士导师。鲁教授的学术领域包括教学论、教育的社会、文化和哲学研究。鲁教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主任。

马塔温 中国科学院中医研究所研究员，他专长研究医学史。他近期在英国伦敦医学院医学社会学系作访问学者。他的学术领域包括中西医历史，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医学知识交流等。他的著作丰富，参加编纂了1979年版的《中医词汇简明辞典》。

阿里·麦树理 (Ali Mazrui)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分校世界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他还同时兼任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尼

日利亚霍斯大学的人文科学和发展研究名誉教授。他出访讲学到过世界各地诸多高等院校，足迹遍布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埃及、肯尼亚、英国和伊拉克等。他的研究领域有非洲政治、国际政治文化和南北关系等。

雷奴卡·纳兰 (Renuka Narang) 孟买大学成人继续教育部主任。她的研究重点是农村妇女的社会公允和地位。她从学术和社会活动两方面对印度教育体制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

沙蜜哈·彼德逊 (Samiha Sidhom. Peterson)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从1972年到1989年在圣欧拉夫学院任了17年教授。她现任埃及教育部顾问，协助制订发展政策，主持研究项目，撰写报告及和国际组织联络等。

阿布杜·雷曼 (Abdul Rahman) 印度全国科学技术和发展研究院的创立人和院长。他还是国际科学政策基金会(英国)的研究员和亚洲分会会长。他还是世界科学史学会会员(法国)，德国科学院院士，雷曼(Rahman)教授从事广泛的国际咨询和研究项目，足迹遍及伊拉克、科威特、巴西、中国和日本。

马吉德·拉尼马 (Majid Rahnema) 加拿大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他正在写《贫穷之考古》一书。他从巴黎大学取得法律博士学位，在伊朗外交事业中创过业绩。他还在哈佛、斯坦福、麦吉尔(加拿大)、联合国大学(日本)和法国尼斯等著名学府任过教。

P·罗加戈鲍 (P·Rajagopal) 在西班牙马德里和英国剑桥大学受的教育，1966年起在加拿大约克大学任教。研究专长为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相互作用。他特别喜好印度数学史。

阿布杜斯·萨拉姆 (Abdus Salam) 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创始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萨拉姆博士还主持多种短训班、学术会，尤其关注和推崇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技术研究。他曾任教于巴基斯坦和英国，至今仍是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的理论物理教授。除了为发展中国家撰写科学报告和教育策略外，他还发表过 270 篇学术论文。

彼德·斯旺 (Peter Swann) 现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和教授。曾在任教于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的同时，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和斯格兰姆博物馆馆长。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东方艺术，发表和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和论文。

王遵贤 中国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和教育学博士导师。在他 40 多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他从事研究了教学论，道德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研究论。他对道德教育的长期贡献得到中国教育界的赞誉。

汪永铨 现任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和教授。他还兼任全国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全国教育研究规划部高等教育分部副主任，汪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高等教育比较、教育管理和政策。

汉斯·惠勒 (Hans Weiler) 斯坦福大学教育和政治科学教授。他访问过诸多国家的高等院校，专长研究比较教育，出版和发表过 7 本学术著作，50 余篇论文。他的近作有《教育领域的政治改革和非改革：比较研究的观点》以及《比较政策研究：从经验中学习》(1987 年出版)。

鸣 谢

“东西方大学与文化”国际学术会的召开和本书的出版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得到中加大学合作项目(CCULP)的特别赞助。这一项目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提供赞助,加拿大高等院校联合会进行管理。在此我们对CIDA和CCULP的中国项目负责人深表感谢。他们从国际主义立场出发,支持国际学术交流和文化合作,使我们有幸邀请到东西方代表世界各大文明的学者与会,我们也同样感谢加拿大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协会为参加此会的北美代表提供赞助。

这次学术会同时也和另外一个富有成果的中加合作项目有关,即中加联合培养教育博士项目。作为中加大学合作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中国7所主要师范大学和加拿大安大略教育研究院(OISE)联合组成。在这个项目中,有22位中国青年教育学者,其中一半是博士生在加拿大接受为期6个月的培训——为他们的论文收集资料,设计新课程并参加合作研究。同样,OISE也选派十多位博士生到中国接受3到6个月的培训,在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并为他们的论文收集信息和资料。

参与此项目的中加双方学者都为本书的准备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92年10月到1993年春,他们参加了每周例会,对本书的6大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讨论,包括对所用论文的筛选

和组织以及撰写各编的介绍和评论使之统一于全书的主题。我们还要特别提及安大略教育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潘乃容、王跃华、陆永玲、仲宁莎、俞理明、王士惠和顾耀明为本书部分章节翻译和校审贡献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和才能。

我们还应当特别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及其总编武修敬先生。他不远万里从武汉来多伦多参加会议,并大力支持出版《东西方大学与文化》的中英文本。我们还要感谢该社副总编冯芳华和胡伟编辑热情承担本书中文版的定稿、编辑工作。我们还要感谢 OISE 出版社主编 Hugh Oliver 先生对这一联合出版项目的大力支持。

最后,我们还要致谢于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文辅相教授、湖南大学校长翁祖泽教授以及其他所有有关人员。他们正在积极筹备下一届 1994 年 5 月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东西方大学与文化》编辑组

1993 年 7 月

序 言

出版这册《东西方大学与文化》论文集出于双重源由：一是基于我的自身经历；二是出于学术。从个人经历来讲，与中国的长期交往对我本身认识世界、认识各种族的人际关系、对各种艺术的鉴赏到如何补足我的西方经典教育熏陶以至我的基督教家庭背景都是一场深刻的挑战。我身居中国 15 年，对中国学术有一定的了解，这种了解，特别是对中国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的专门研究促成了我深刻的内在转变，并激发出我推动众人理解交流中国哲理和文化的强烈愿望。

同时，从我 60 年代晚期开始接触认识中国至今，我耳闻目睹了中国社会的不停顿的动荡和变革——从闭关自守式的社会主义到激进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从 80 年代的开放政策——面向世界到当今汹涌的经济改革、创现代化热潮，这种种社会现象都令人们深思。中国社会和学术界鉴于文化大革命对平等社会探求的失败，对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消亡以及如何重新评估孔学都作了很深刻的反思和论析。进而人们开始引进现代世界热门概念诸如“效益”，“人才投资”“现代化”这些早为西方社会经历和曲解了的名词。人们无疑在继续探寻开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重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钥匙。

综上所述，一方面，中国大有可向其他东方文明古国比如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吸取和借鉴经验之处，他们在五六十年代就借

助世界银行和西方援助使学术界得以重振,进行文化和经济体系的分析研究。另一方面,中国同时也有许多值得他国借鉴之长处,诸如它的沿用传统文明,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医学医药给世界当代医学科学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行医模式,从而也为世界各国对维护文化遗产的探求提供了正面的实证。更重要的是这类实证使世界看到了中国学术界有其本身的真谛,而又有其对外来文化的反映力,中国学者有史以来虽然屡遭内在政治和社会压制,然而中国社会和文化却又紧紧扎根于本土文明,这就是中国学者没有像其他东方邻国的那些受西方教育熏陶的贵族们所体验到的对本土文化的不适和异感的根本原因。

这次国际学术会“东西方大学与文化”旨在会拢来自中国、印度、非洲和阿拉伯等代表世界各大文明的学者们和西方学界共同探讨知识的起源及创进。西方学术界尤为关注对源于西方社会本身的知识及其现代性的基本评判,因为这些现代知识常包含东方文化观点和评论的结果。一方面,我们希望来自各大东方文明的学者们共同分享和交流文化学术的精华及他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更希望促进东西方学者的对话,对知识发展的根源和性质进行深入的探讨,本书各章节都综合了东西方学者对议题的论解从而能与读者共享东西方文化交磋的余音。

学术理论探讨是另一促使我们编辑此书的主要动力,基于国际学术界正极力探求在当今的世界秩序范畴中如何综合地、系统地分析思考知识和大学的关系。一方面,当代的比较教育理论将有助于建立高等教育和其特定文化历史关联性的理论框架,基于当前还未有一种国际间认同的大学办学体系,这种理论框架将有助于对世界各种不同社会范式的系统比较,旨在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前景绘出人类共赏的蓝图。另一方面,国际关系

理论在不断从以前的极端欧洲中心主义向多元化发展,正趋向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转换、改革方法论来认识和分析当今的世界秩序,而大学、知识和文化的关系在世界范畴内的论述却还未得到足够的注意,由此我们关注的是怎样推进和发展新的思维模式,通过比较教育和国际关系理论来阐述大学在国际范畴中的知识更新和知识传播的实体作用。正是这种动力和意图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系一门新课“论国际学术关系”的产生,1988年起开课。

经过编委们广泛的讨论磋商,我们决定将全书分成六个部分,各部分的编辑大都是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比较国际教育领域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积极参与了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组织工作,同时帮助开闢这门“国际学术关系”课程,努力试图在比较教育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对国际学术关系理论有特别贡献的两位学者麦树理(Mazrui)和惠勒(Weiler)出席了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并让本书发表他们的文章。在此我想特别提及两篇在课程中有重要价值的代表作。一篇是阿里·麦树理(Ali Mazrui)于1975年在哈佛《教育理论综述》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该文创见性地将非洲大学看作一个国际跨国公司,提出了大学的文化功能到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潜能问题。另一篇是汉斯·惠勒(Hans Weiler)在1983年国际比较教育年会上作的爱格森演讲报告,从德国社会学和哲学的根基上扩展到广义的西方学界的角度对知识和权势问题作了论述。我们把这两位学者在“东西方大学与文化”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放在卷首以奠定此书的中心议题:即大学经由知识再生和传播媒介对改变国际环境和秩序的潜在贡献。

本书第一部分内我们还编入了知名伊朗学者和外交家马吉德·拉尼马(Majid Rahnema)的文章,鼓动高等教育界和社会

学家们“从创建大一流理论中解放出来”，进而对推崇不囿于西方传统正统派科学论的本土知识提出新的见解，第一编最后一章是一位来自中东的女学者的论文，试图对当今社会科学范畴的变化对西方教育研究的影响作一综述，旨在探求一个与中东社会环境较相容的范式——一个和西方理论相关联的又吸取了伊斯兰精神文化的范式，没有这种本土根源结合于伊斯兰精神的意识，对中东的教育研究将会忽略基本。

本书的第二部分聚焦于科学知识以及东西方社会大学所面临的抉择。论者从印度知名学者阿布杜·雷曼(Abdul Rahman)开始，他阐述了当前科学技术思想和传统文化社会背景在知识创新过程中的冲突。第二位科学哲学论者约瑟夫·艾加斯(Goseph Agassi)对主题展开批判论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美大学成功地受命于高等基础科学研究而今天却面临着重重在经济、道德和社会责任观念等诸方面的困扰。接着著名加拿大女材料科学家乌苏拉·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从深度和广度上对科学技术发展和传统文化对整个知识体的影响作了创建性的评论，指出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即全球范围的“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正危及不同知识系统和传统文化技术的继承和发展，本篇最后一章的作者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阿布杜斯·萨拉姆(Abdus Salam)教授。他多年来致力扶植第三世界科学事业，在意大利丘斯特创立了第三世界科学院，对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学术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萨拉姆(Salam)着重指出第三世界社会不但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同时也要重视应用科学和技术更新，他主持的国际理论物理研究中心旨在让第三世界科学家们联合贡献学术于世界科学遗产。他的论文还指出东方社会传统文化的灵性对于科学知识的形成是一种内涵力而非从属性。

现代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形式之上的原因之一恐怕是它对今天和明天的务须性和对昨天的遗忘性。本书第三部分所载论文都以光顾科学史来提醒人们注意早期的印度数学和伊斯兰精密科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世界科学遗产作出的贡献。同时还提请人们看到这些科学观点如何从宗教和文化中得到启迪而演变发展。中国传统科学和医学就是具有独特丰富完整的知识体系的例证。后两篇论文也追溯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中西医的相辅相承以及中国的原始科学观对西方相对论科学思想的关联和启迪。

如果现代科学在各类知识中占主导地位的话,我们也该意识到本土文化和技术在社会知识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在国际知识结构中的地位。与此紧密相关的议题便是跨社会跨文化的知识再生和传播渠道的问题。当今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各发达国家的国际发展援助署在这过程中任主导。本书第四部分首先由埃及和中国学者就跨文化知识转换和移栽的问题和抉择展开讨论,埃及女学者彼德逊(Peterson)提出了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组织在决定知识传递过程中的微观动力的理论框架,而中国学者提供了广泛的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结合的例证以及知识界动力促使社会变革的历史渊源。与此同时美国比较教育学家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从西方学术界的角度阐述了他多年来对印度高等教育及世界知识结构的研究,试图探讨中印两大东方国家在国际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前加拿大驻华大使 Earl Drake 教授从世界银行的宗旨角度分析了世界银行对印度以及近年来对中国的知识传递和人才开发项目。从广义上说,本编触及了一些在知识转换移栽中面临的棘手问题:诸如在跨文化知识传递过程中所涉及的个人和群体以及他们的组织文化,知识移栽内容的选择和程序,相互作用

的特性和质量等等。

在大多数社会,教育对反映本土文化和精神知识的关联最为敏感,在本书的第五部分,四位女学者就现代教育制度的抉择和制定作了不同角度的探讨,阐述了在各自特定的教育体制下继承发展本土文化问题。其中三位学者与其说是教育理论的探讨者,不如说是教育领域的实践者。中国的鲁洁教授在不断摸索教育博士的培养标准问题;伊朗的巴盖里恩(Bagherian)正致力探索教育传统如何服务于当今的教育改革,印度学者纳兰(Narang)给与会者谈了为农村妇女设置业余大学课程的规划。这些论文虽都从现实报告着手而非理论论文,它们却展示了一幅三个东方社会积极在发展本土知识文化基础上推崇教育的生动写照。

第五部分最后一章是加拿大印第安土著女学者柯可那斯(Kirkness)和布哈特(Barnhardt)合著的论文,它阐述和分析了加拿大印第安土著学生进入主流大学求学所经历的民族距离和误解,她们请求社会对本土文化知识价值的认同,因为民族传统是整个文化的一个不可否认的综合部分。而这种认同将会从正面促进土著人对发展社区所需的知识技能的吸取从而缩小和主流民族的差异。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以中国为鉴回顾了历史上中国和西方文化交融的盛衰,中国西北师范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学家李秉德教授首先作了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纵观,展示了对外开放在中国史上的一贯象征。继而他分析了中国教育思想如何吸取了一系列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影响。接着几位西方学者的论文都展示了中国科学和社会学思想对西方和欧洲启蒙运动所作的重大贡献,尤其是中国艺术和文物对欧洲的影响可追溯到更远。这种双向交往和交流的价值将继续往开来,正如当今中国的文学艺术也